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项目
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智库论丛

黄玉琴 著

性别视角下的 村庄社会生活变迁

华中莲荷村的劳动、闲暇、女性及家庭
(1926-2013)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黄玉琴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副教授，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社会学博士，曾任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族群多样性研究所研究员（2009–2013）。主要致力于性别与发展、迁移和宗教等方面的研究。出版专著/合著2部，在Asian Population Studies等中英文期刊上发表论文近20篇。

性别视角下的 村庄社会生活变迁

华中莲荷村的劳动、闲暇、女性及家庭
(1926-2013)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项目

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智库论丛

性别视角下的村庄社会生活变迁：

华中莲荷村的劳动、闲暇、女性及家庭(1926—2013)

黄玉琴 著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 上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性别视角下的村庄社会生活变迁：华中莲荷村的劳动、闲暇、女性及家庭：1926—2013/黄玉琴著.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9.1

(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智库论丛)

ISBN 978-7-5628-5704-4

I. ①性… II. ①黄… III. ①农村—女性—社会生活—研究—中国—1926-2013 IV. ①D669.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04526 号

策划编辑 / 刘 军

责任编辑 / 牟小林

装帧设计 / 徐 蓉

出版发行 /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梅陇路 130 号，200237

电话：021-64250306

网址：www.ecustpress.cn

邮箱：zongbianban@ecustpress.cn

印 刷 /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 17.25

字 数 / 247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9 年 1 月第 1 次

定 价 / 8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 容 提 要

中国的村庄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发生了巨变，同时，男女村民的生活也面临不断的延续和变迁。本书综合了社会学、性别研究、社会历史和人口学的方法，从性别视角，以“劳动”和“闲暇”为透镜，考察了华中莲荷村在过去近90年间（1926—2013）的变与不变。本书探讨了不同代际的女性和男性劳动、闲暇的变迁与延续，其组织过程中不同性别及代际间变动的权力关系，以及这些权力关系在家庭内外的表现和形成机制。本书使用了一个“双重比较”的框架，一方面纵向考察前集体时代、集体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村庄中劳动和闲暇在不同性别及代际间的分化；另一方面横向追踪村庄女性在少女时代、年轻母亲时代及老年时期劳动和闲暇生活的变迁和延续。本书采用了一个全面的、关系性的视角考察了有酬/无酬，家庭/劳动，家庭内/外，劳动/闲暇等原本被二分的领域并探讨这些领域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本书将莲荷村女性和男性在变化着的家庭中的角色和更广大范围内的社会经济、政治、人口和文化变迁联系起来，展现了村庄社会性别制度的嬗变，影响这种嬗变的个体、家庭、市场和国家层面的因素及与此相关的微观、宏观动态。

致 谢

在本书的“导言”部分，我追踪了自己开始本研究的心路历程。这个研究起始于一个以学术的视角来理解自己的成长之旅的企图心。从 2005 年的田野研究开始，本书首先建立在我于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之上。后来，随着多次对莲荷村的重访，研究的内容得以扩充和更新。

我最要感谢的就是愿意接纳我的，来自莲荷村的这些女性和男性们。他们毫无保留地和我分享了生命故事。这些故事不仅成为这本书的基础和源泉，也成就了我的自我探寻之旅。今年年初，书中的桃英去世，享年 81 岁。在过去几年里，书中所研究的第一代女性中，已有多位陆陆续续离世，第二代的“大姐组”中也有几位英年早逝。这本书是对她们的一个纪念。

要感谢一路伴我成长的师友们。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已故的王汉生教授和埃塞克斯大学的 Miriam Glucksmann 教授分别是我硕士和博士期间的导师。两位教授皆思想活跃、成就斐然，是我的领路人。我在德国马普宗教与族群多样性研究所和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的诸多同事是我工作至今的良伴，一路对我陪伴、督促、启发和鼓励。

要感谢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的刘军和牟小林两位老师。他们帮我申请到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的资助，对我的书稿从文字到内容都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并对我的拖沓表现出了无比的宽容。

要感谢我的家人，尤其是家族中的女性。她们所展现出的生活智慧让

我更深刻地理解了女性在当代社会中生存的处境。她们的教导、分享和援手都使我获益良多。

本书第四、五、六章的部分内容曾以 “‘To jump out of the agricultural gate (tiao chu nong men)’ : social mobility and gendered intra-household resource distribution among children in a central Chinese village, 1950 – 2012” 为题发表于 *China Perspectives*, 2012 (4): 25 – 33。

第五、六章的部分内容曾以 “向上流动渠道和农村教育性别平等：华中莲荷村的变迁（1958~2012）” 为题发表于《学习与实践》，2016（1）：108 – 117。

第四、五、六、七章的部分内容曾以 “Transforming the gendered organisation of childcare: experiences of three generations of rural mothers in an inland Chinese village (1940s – 2006)” 发表于 Angela W. W. Ching, Maria Tam and Danning Wang (eds.) *Gender and Family in East Asia*, 2014,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第七章的部分内容曾以 “From the ‘feminization of agriculture’ to the ‘ageing of farming populations’: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farming in a central Chinese village” 为题发表于 *Local Economy*, 2012, 27 (1): 19 – 32。

第八章的部分内容曾以 “Changing intergenerational contracts: gender, cohorts and elder care in central rural China, 2005 – 2013” 为题发表于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2018, 14 (1): 5 – 21。

第九章的部分内容曾以 “Labour, leisure, gender and generation: the organisation of ‘wan’ and the notion of ‘gender equality’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 为题发表于 Tamara Jacka and Sally Sargeson (eds.), *Women, Gender and 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 2011,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目录

第一章 导言 /1

第二章 局内人或/和局外人，抑或都不是：研究三代农村女性的生活 /28

第一部分 前集体时代（1926—1956）的劳动、闲暇和性别

第三章 “第一代放足者”（1926—1956）的劳动、闲暇和家庭 /43

第二部分 集体时代（1956—1983）的劳动、闲暇和性别

第四章 集体时代的年轻妈妈们 /66

第五章 分裂的一代：“战后婴儿潮”中的姐妹们 /88

第三部分 改革开放时期（1983—2013）的劳动、闲暇和性别

第六章 “计划生育一代”已长成：改革开放时期的女孩们 /120

第七章 各人事不同：改革时期的性别、代际、劳动分工和农业发展 /149

第八章 劳作的老人：农村中的代际契约、养老和性别 /169

第九章 劳动、闲暇、性别和代际：莲荷村的“玩”和性别平等 /196

第四部分 变迁乡村社会中的政治参与（1944—2013）

第十章 两代妇女主任的政治参与（1944—2013） /219

第十一章 结语 /237

参考文献 /257

第一章

导 言

自 20 世纪初期以来，中国农村女性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一个更广泛的层次上，本书是从“性别”的视角和农村女性的角度来考察从 1926—2013 年近 90 年间村庄社会生活的变迁。考察所借助的工具是华中汉水县莲荷村三代 57 位女性在这近 90 年间的生命故事。在一个更具体的层次上，本书通过一个独特的“双重比较”框架，分析了三代农村女性各种不同形式的劳动和闲暇活动是如何在家庭内部组织起来的。透过对她们劳动和闲暇生活的关注，本书触及了过去近 90 年间农村社会生活中的性别、劳动、闲暇、家庭、教育、养老等议题。本书同时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角度比较了莲荷村女性的劳动和闲暇生活：一方面，从历史的时间，即前集体主义时期、集体主义时期和改革时期；另一方面，从女性生命历程阶段，比如少女时期、初为人母时期和老年时期。

本书不仅关注莲荷村女性的“劳动”，也将注意力放在目前学界关注尚少的“闲暇”上面。而且，本书采用了“劳动的总体性社会组织过程”模型（Total Social Organisation of Labour，即 TSOL 模型），从一个总体的（holistic）、互为关系性的（inter-relational）视角审视了村民的劳动和闲暇生活（Glucksmann, 2000: 19–20）。“双重比较”的框架不仅关注社会变迁（尤其是 1949 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 1983 年前后的改革开放）如何影响农村女性的劳动和闲暇生活，也重视从不同代际女性自身的视角，来审视她们如何经历这些社会变迁。本书探讨变迁的同时也考量延续性，尤其强调在劳动和闲暇的社会组织过程中，发生在不同女性之间，以及女性和男性之

间的权力关系。我们不仅追问“发生了什么变迁/什么延续下来了?”我们也会追究背后的机制,“为什么这些变迁/延续会发生,如何发生的?”

其次,本书采用了交叉分析的方法(intersectional approach)来探讨变迁/延续背后的机制。本书认为,不同女性和男性之间劳动和闲暇生活的差异、延续和权力关系,都是由外在的/结构性的因素和家庭内的因素之间复杂的互动而产生的。外在的/结构性的因素是指社会经济的、政治的、人口的和文化的影响,而家庭内的因素则指在家庭和个体层面的因素。通过分析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及女性不同的生命历程阶段相交叉的点上,不同层次的因素之间的互动,本书将揭示不同的劳动和闲暇模式的转变,总结决定农村女性劳动和闲暇生活的主要因素,揭示女性之间存在的相互依赖和不平等的关系,阐释家庭内外的世界中的性别关系,追踪不同代际女性的自我认同及其变迁,并探寻男性和女性对夫妻公平和性别平等的理解。

最后,本书不仅呈现了研究的“最终结果”,而且也开放了研究的“之前”和“处于中间”的阶段(Glucksmann, 2000: 1),即研究兴趣的发展,研究焦点的寻找过程,研究框架和理论方法形成的过程。同时,我反思了自己在民族志开展过程中的角色,即从自身和研究参与者的角度来看,我的角色形成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处在“局内人或/和局外人,抑或都不是”的变动过程之中。

一、追踪研究的轨迹

作为一名在华中农村长大的女性,本书的研究旨趣和我自身的经历,以及学术兴趣发展历程有紧密的联系。这进一步影响了本书的研究框架。

(一) 我的路

作为一名 20 世纪 70 年代末出生的农村女性,从七岁起,我的母亲就

不断地在我耳边叮嘱：“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啊。好好上学才能‘读出去’。除了这个，你没有别的出路了！”因为我一直成绩优异，所以加诸我身上的期望值越来越高。读书期间，父母很少让我帮忙料理家务，基本上没有参与过农耕。而我的父母，在几亩土地中辛勤耕耘，供我和弟弟读书。往往入不敷出，时常在要交学费的日子去找亲戚借钱或者找供销社贷款。这条求学之路在1996年我考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达到顶峰，之后转入另外一种风格的求学道路。1996年我如愿以偿地“跳出了农门”——通过高考将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在我们村这是第一次有人考上最高学府（之前有几个人考上中专）。发榜的那天，我祖父和父亲在屋后祖宗们的坟前燃放了不少鞭炮，一是为了告知祖先们这件喜讯；二是昭告村民，即使我是一个女孩，也做到了“光宗耀祖”。祖父还告诉我，有时候他在路上会被陌生人拦住，被询问我的外形特点，因为当地很多村民认为人的命运写在脸上。我祖父骄傲地告诉他们，我前额宽阔，必定会前途远大，是一个福相。近四年后，当我快要大学毕业时，才得知祖父逝于胃癌，家人怕我担忧，就没有告诉我。我半年前离家时，祖父身体已不济，但还没有发展成癌症。我走之前祖母悄悄告诉我，祖父曾说，知道我要毕业了，没想过我做什么别的职业，只要我能在省里做个妇女主任就可以了！在老人家的意识里，当然“做官”是最好的。而一个女孩能做的官，在他的经验里，就是管理与妇女相关事务的“妇女主任”了。在中央不易，能在省里就可以了。在老人家的逻辑里，这是最现实也是最好的安排。

最终，我祖父的愿望没能实现，我选择了继续学业并最终走上学术之路。但我的家庭对我的期待、对我教育的投资都引起了极大的兴趣。首先，从家庭历史来讲，我奶奶一辈和母亲一辈的生活和我的截然不同。我奶奶是被爷爷“抢”回来的。两家本来之前定过亲，但不知为什么，奶奶的父亲不愿意了。结果爷爷半夜携本家兄弟数人趁奶奶起夜时用被子裹上背回了家。我妈妈是家里的长女，下面有弟妹六人。妈妈上小学正值集体时期。她上了不到三年，外婆就求她，说家里没有劳力，让她回家照顾弟妹，进生产队挣工分。而我，虽然家庭经济条件有限，但当我展

现出读书的能力时，父母举债也要供我读书。母亲“好好学习，跳出农门”的教导更是陪伴我数十年。不是男孩，但在家人眼里，我也“光宗耀祖”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代际差异？“自上而下”的视角会认为这是历史变迁和政治政策变化带来的改变。但这种解释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它无法解释这些外在的变动和政策如何被村庄的人们接受/不接受，他们如何经历这些大的、宏观的社会历史变迁。或者如 Myron L. Cohen (1993) 所说，中国的农民们在面对外来冲击和影响的时候，并不像通常所想象的那样被动。当然，前文所述的代际差异显示的，是一个关于村庄生活历史变迁的故事。有关中国村庄社会生活变迁的研究，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从 20 世纪初至 20 世纪 40 年代，是中国村落研究的源起阶段；之后，经历了 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的“内滞外销”阶段，即海外关于中国村庄研究多于国内的研究；再到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发展反思阶段。这一阶段的村庄研究因学科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关注点。比如，人类学主要对村庄的宗族制度、民间信仰、仪式、符号象征系统等展开研究；社会学的手点放在革命和改革带来的“变迁”和“延续”上，充分考察乡村的社会结构、文化、人口结构、生产消费等方面的变与不变；政治学则集中在对村庄权力的分配及其运作机制的研究（刘翠霞、林聚任，2009：55-77）。在这些研究中，鲜有从“性别”的视角，以及农村女性的角度来考察村庄社会生活变迁的。^① 试问，如果从“性别”的视角来看，村庄社会生活的变迁将会是何种样态？从农村女性的角度来看的话，在她们眼中，之前的村庄研究所关注的宗族、社会结构、文化、人口、生产消费和政治等议题会被如何解读？本书于是立志于站在村庄中女性的视角，来观察和解读村庄过去近 90 年间社会生活的变迁。对这些农村女性来讲，她们及村庄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这些改变是如何发生的？本书正是要透过对农村

^① Laurel Bossen 于 2002 年出版的 *Chinese Women and Rural Development: Sixty Years of Change in Lu Village, Yunnan* 是个少见的例外。这本书从性别视角考察了云南禄村过去 60 年间的变迁。后面文献部分会进一步详述。

女性日常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几个方面（劳动、闲暇）的考察，来回应以上问题。

（二）既有关于中国农村女性劳动的研究

回望过去近 100 年的历史，从很大程度上，中国农村的劳动制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1956 年开始的集体化运动将土地由私有转为公有，1978 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时代，大部分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一小部分土地又转为个人所有（莲荷村村民称为私有田）。劳动的组织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时代兴起了非农职业，等等。相较于农村男性来说，这段历史对农村女性更为关键，因为这是她们更多参与公共生产的时期。在 1949 年之前的前集体时代，虽然各地存在差异，并且因季节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学者们认为，农村女性在农业中“扮演的角色很小”（Davin, 1976: 121）。那时的农村女孩在农耕方面所受的训练非常少（Jacka, 1997: 23）。随着 1949 年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农村女性被大规模地动员去参与集体劳动。到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百分之八九十的身体健康的农村女性都在田里劳作。^①同时，农村女性每年劳动的天数也显著增加。到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随着集体制的解散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出，农村女性的劳动时间更加灵活了，也更可能从事非农劳动，以及成为农业专业户。但纵观整个这段历史，家务和照料工作仍然主要是女性承担的（Croll, 1985b; Davin, 1976; Jacka, 1997; Judd, 1994）。

而且，因为上文提到的过去近百年劳动制度的变迁，农村女性的劳动从最开始就成为研究中国农村女性的学者关注的对象。基本上，关于中国当代农村女性的既有研究主要是对女性遭遇现代化和工业化过程的一个回应，尤其是中国历史上的两大社会变迁，即 1949 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

^① 这个数字是由 Marina Thorborg 提出的（Jacka, 1997）。但这个数字本身有点令人困惑，因为不知作者是基于所有年龄阶段的女性，还是只是那些适于充当劳动力的女性基础上推出来的。同时，E. Croll 给出的数字是，1958 年农村女性的公共劳动参与率是 90%（Croll, 1985b）。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市场化改革，如何影响了女性的生活。大部分的研究可以放入“变化—解放”的模型中。在这个模型中，学者通过探讨农村女性通过自己的劳动所作的贡献和她们从社会变迁中获得了何种益处，来评价她们是否获得解放。关注社会主义革命或者改革开放的性别后果的学者，多将目光放在如下领域：农村女性所从事的劳动；她们获得财产，尤其是农地的状况；收入的性别差距；如何处理有酬劳动和无酬的家务、照料劳动之间的冲突；对家务和照料劳动的价值的确认；农村女性的有酬劳动如何影响她们在家庭中的权力和地位；不同的劳动活动如何影响女性的社会网络，等等。而对女性在家庭中的权力和地位的评估通常会采用某些指标。比如，控制收入的权力和做家庭重大决定的权力，等等。

学界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关注社会主义革命对农村女性劳动生活的影响，此时西方学界对中国女性的研究刚刚起步（王政，1997）。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市场化改革开始后，学界对这方面的兴趣经历了一个低潮，但近些年又有某种程度的复苏，因为一些学者开始研究集体时代的“铁姑娘”和“女劳动模范”现象（高小贤，2005；金一虹，2006；Hershatter, 2000；Honig, 2000）。Lisa Rofel 指出，在研究的早期，因为资料的匮乏，研究主要建立在对官方文献的解读上，因此“弥散着一股乐观的氛围”（Rofel, 1999: 291）。

这一时期的作品详细描述了“土地改革”和《婚姻法》的实行，并分析了相关法律和政策对农村女性的劳动、婚姻和家庭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学者们对农村年轻女性通过集体劳动提升了自己在家庭中地位，以及扩展了自己的社会网络，纷纷表示欢迎（Croll, 1978；Davín, 1976）。但大部分研究将关注的目光放在女性身上，没有考虑到当时的女性相较于男性的地位变化，这导致研究中存在“劳动的性别分工研究盲区”（Jacka, 1997: 10）。

但随着可获得的研究资料的增加，学界发现越来越多存在性别不平等的领域。比如，劳动的性别分工、男女工分差距、集体和家庭内部的性别权力，女性要承担有酬劳动和家务照料等无酬劳动所带来的“双重负担”、

丈夫和妻子对收入控制的不对等，等等。无一例外，在这些领域，女性都处于较弱势的地位。另外，这些学者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对农村女性也是一种父权制的力量，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女性的弱势地位。革命初期的诺言并没有兑现，因此，中国女性的性别革命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Andors, 1983; Stacey, 1983; Wolf, 1985）。

近期一些学者关注集体时代的“铁姑娘”和“女劳动模范”的现象，尤其是她们是如何在自身生活经历和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产生的，她们付出了什么，得到了什么；这段经历如何影响她们之后的生活，尤其是她们的自我认同，过去繁重劳动所带来的荣誉和疾病；等等（高小贤，2005；金一虹，2006；Hershatter, 2000；Honig, 2000）。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从方法论上和前期的作品不同。前期的研究多建立在对官方文件的分析上，这一阶段的研究多建立在口述史访谈的基础上。这种方法的优点我们稍后会谈到。

在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时期，学者们开始关注新出现的非农劳动市场和农村女性拥有的新的工作机会。起初，一些女性主义学者担心集体制度的终结，以及回归以家庭为单位的农耕是否会将农村女性重新置于具有父权制色彩的家庭之中（Andors, 1983; Croll, 1983; Davin, 1988），但随着新的性别分工模式的浮现，这些担忧变得不那么必要了。新的研究话题涌现，包括乡城劳动力迁移对农村女性劳动的影响。一些学者指出，自从市场化以来，虽然农村女性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但她们的获益不如男性多；而且，在某些方面，压迫甚至加深了（Croll, 1983; Jacka, 1997）。从劳动分工的角度讲，大部分男性和年轻一些的女性离家打工，且数量呈上升趋势，导致农业的女性化程度加深（Bossen 2002; Croll 1983, 1994, 1995; Davin 1999; Jacka 1992, 1997; Judd 1994）。一方面，一些对“打工妹”的研究指出，随着年轻女孩对有酬非农劳动的参与，她们在家庭中的话语权增加了，年轻一代日渐超过老一代，成为农村家庭的主导力量（Yan, 2003）。但另一方面，外出打工的年轻女性也不得不忍受薪水比男性少，工作环境严苛，工作中的歧视和性骚扰等境况（Pun, 2000; Tan, 2000; 谭深, 2004）。另外

劳动法规的缺乏和宿舍制也使得这些女孩处在严厉的劳动控制和训诫之下 (Pun, 2007)。农村女性,尤其是已婚的,出去打工的机会少一些,因为她们不得不在家承担家务、照料家庭;而那些在外打工几年后回到家乡的女性,则很难再适应家庭的生活和在老家的婚姻(谭深,2004)。Ellen Judd 则指出,在整个过程中,男性、国家甚至是女性自身,都没有对女性从事的劳动,不论是有酬还是无酬的,给予充分的肯定 (Judd, 1990)。

学者也发现,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集体时代到改革开放时代,国家所推崇的、跟劳动和性别有关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在发生变化。从 20 世纪 50 至 80 年代初的集体主义时代,国家鼓励女性走出以前的私人领域,参与以前由男性主宰的公共劳动。而发生在私人领域的劳动(家务劳动)的价值是被贬低的 (Yang, 1999; Jacka, 2006)。但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市场化时代,国家从私人生活领域(部分)撤出以后,“家庭”和市场所引导的“文化制度”对形塑“什么是理想的女性形象”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女性气质”(femininity)、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被重新强调 (Rofel, 1999),消费行为成为彰显女性气质的一个重要内容 (Yang, 1999)。换句话说,女性在“私人领域”的劳动重新被认为很重要。但与之相对应的是,受国家力量引导的各级妇联则鼓励妇女们在市场中竞争,实现“自尊”“自信”“自立”和“自强”。这是市场化的性别意识形态对“私人领域”劳动强调之外,对“公共领域”劳动的再次看重 (Jacka, 2006)。因此,从集体时代到后集体时代,经历了一个从“对传统女性气质和私人领域劳动的贬低、对公共领域劳动的强调”到“女性气质的重新回归”“对母职的重新重视”的变化。这一系列的变化,构成了形塑不同时代的农村女性劳动生活的一个重要背景。

国内学者对中国女性的关注则比西方学界晚一些。除了金一虹 (2006)、高小贤 (2005) 等对集体时代农村女性劳动的关注之外,国内学者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改革开放时代女性的劳动上面。和西方学界相比,国内学界更多地关注改革开放给女性带来的“时代问题”。比如,在经济浪潮中获得成功的男性抛弃原配,找年轻漂亮的新妻子等现象。这些现象在